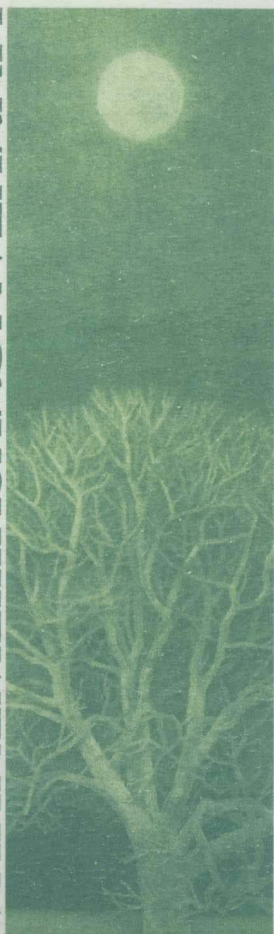


冯羽 著

林语堂与世界文化



LINYUTANGYUSHIJIEWENHUA

江苏文艺出版社

JU-2000 LITERATURE AND ART
DESIGNING HOUSE

冯羽 著

林语堂与世界文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与世界文化/冯羽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399-2160-9

I.林... II.冯... III.东西文化-研究
IV.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002 号

- 书 名 林语堂与世界文化
著 者 冯 羽
责任编辑 陈敏莉
责任校对 王志英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160-9/I·2039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林语堂观看女儿林太乙使用他所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目录

上 编 跨学科论域中的林学景观【1】

第一辑 信仰归途：林语堂与基督宗教【3】

第一章 世界文学、文化与基督教的关联【3】

第二章 林语堂与中国闽南基督教【19】

第三章 林语堂与西方传教士【28】

第二辑 通才境界：林语堂与东西文化【41】

第四章 林语堂、辜鸿铭与东学西传【41】

第五章 林语堂与中外翻译学【56】

第六章 林语堂与自然科学【69】

第三辑 性灵空间：林语堂与世界文学【84】

第七章 林语堂与诺贝尔文学家族【84】

第八章 林语堂的比较文学视域【102】

第九章 林语堂与海外华文文学【117】

目
录

下 编 跨文化语境中的林学研究【127】

第四辑 林语堂评传(日文)【129】

第一章 世界的林语堂——人生之旅【136】

第二章 林语堂的世界——文学之旅【151】

第三章 林语堂的世界宗教——信仰之旅【174】

第五辑 林语堂年谱(日文)【192】

编者序——家族记事——童年、少年——圣约翰时

代——留学欧美——归国——上海文坛——世界的

LIN YU-TANG——多彩的晚秋

附录一 林语堂年谱(中译文)【236】

附录二 林语堂创作年表【273】

附录三 相关经典文本解读【277】

参考文献【301】

后记【319】

上 编

跨学科论域中的林学景观

第一辑 信仰归途：林语堂与基督教 宗教

第一章 世界文学、文化与基督教的关联

基督教对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无疑是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诸方面原因，导致这一研究领域始终少人问津，有时甚至几近空白。值得欣慰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潜心深入的钻研与开拓，及其为数可观的论文、论著的不断面世，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和世界文学关系的“问题意识”已经日益浓厚和凸现。

一、基督教文化的源流

文学和宗教同属意识形态，它们和人类的关系同样漫长而遥远。在人类社会的原初阶段，文学和宗教更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文学往往是宗教的载体，而宗教的传播过程也就是文学的展示过程。首先，宗教作为人类源远流长的精神现象，在人类的历史衍变中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任何对它的漠视和轻蔑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无知和亵渎。其次，对文学的研究不可能抛开对宗教的研究。马克思曾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

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是幻想的太阳”，^[1]马克思的这句话再形象不过地表现了两者之间的因缘。海德格尔也有过这样的表述：“灵魂的本质在于，在流浪中寻找大地，以便灵魂能够通过诗而在大地上落脚和安居，最后拯救作为大地的大地。”^[2]这里，“灵魂”其实就是宗教的代称。恩格斯也曾以诗意盎然的语句描写道：“到教堂的外面向上帝祈祷吧，因为他的大厦不是凡人的双手建造的，他的气息渗进了全世界，他要人们顶礼膜拜的是他的精神和真理。”^[3]

由此可见，文学的目的在于寻找人类最终的精神家园和命运归宿，而宗教的意义则在于替人类的灵魂发现一块净土，一片了无纤尘澄明清澈的彼岸世界，两者的终极价值可谓异曲同工。因而，对宗教文化和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是形象学上一个永恒的课题。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不可能没有宗教文化的元素和气息，即使它们已经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却也会在意识深处影响作家的创作，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特定的制约作用，发现这些或内在或外在的影响能使我们隔代的后人更深地进入研究的对象世界中，更准确地解读那个时代的作品，更清晰看出文学变幻发展的脉络，进而由对文学的认识进入到对那个时代精神的把握，并且对以后文学发展的预测提供历史的依据，甚至可以使彷徨的文学走出歧路而尽早走上生命的坦途。

基督教始创于公元1世纪。开始时，它仅仅是罗马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地区苦难的犹太人信仰的一种宗教，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地区。经过1054年东派和西派教会的分裂以及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分裂为三派，即，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者虽有区别，但都以《圣经》作为经典，认为它是上帝的启示，具有最高的权威。基督教的中心教义是博爱，据言这是上帝启示于十字架上

的真理，它表明，只有爱才是生活的法则。同时认为上帝、圣子耶稣和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人虽为上帝所造，但负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必陷于苦难，只有忠于基督教才能蒙救、永生。

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化一直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是西方文明的一大渊源。由于它的历史发展的曲折，故造成西方文化影响的复杂。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经院哲学的双重魔影，使当时的文化普遍遭陷于平板苍白、无力。而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拉斐尔的圣母像，还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都是借用基督教的热情或者《圣经》故事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19、20 世纪之交，基督教日益挣脱僵化的模式，具备了适应现代生活的灵活性，它的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还影响了追求“彼岸的超自然力量”的现代主义文学，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

纵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变迁，最显著的一点莫过于它的精神和实质已浸淫在西方文化的血脉中，并且左右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方式，成为西方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条主脉。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随之而起的航海业的发达，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基督教的影响已超过欧洲本土向美洲、亚洲、非洲渗透，随着基督教的日趋世界化，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基督教文化在带给本土以外地区以基督教的上帝概念和《圣经》启示的同时，也带去了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和理性、民主和人权。在全球范围，19 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以西方为辐射中心的张扬理性、情感，标举个性和重塑价值观念的世纪，人们开始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宗教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认为它从中表现或者说是积淀了人对宇宙世界的思考，对人本体的独特认识，对艺术美的向往，体现着人的某种本质意义。

二、基督教与中国社会

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在三至四世纪。二世纪末罗马作家安诺比斯的《斥异端》(Adversus Gentes 2, 12)中曾经列举耶稣福音已传至中国。五世纪由于聂斯脱里派深入内地,使基督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在唐代,被人们称为“景教”,意思是“光明的宗教”。明代发掘的《景教流行中国碑》对景教的传布有详细记载。景教兴旺于七世纪中叶,八世纪便告衰退。九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被禁后,到元朝建立才慢慢恢复元气。元代对基督教统称“也里可温教”,意思是“有福缘的人”,它包括早先流行的聂斯脱里教派,也兼指后来传入的罗马圣方济各教派。元政府很推崇也里可温。到十六世纪中叶的明朝,由于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能巧妙利用中国人的心理,以鼓吹学术为掩护来达到传教目的,故他进入北京后,信徒日增,成就可观。清康熙帝原本任用基督教传教士为其服务,并不排斥基督教,十八世纪初由于个别传教士的越轨行为,康熙下令驱逐传教士。乾隆时,刑部对于私人传教者有永远监禁的判决,至此,基督教传播中衰。鸦片战争开始,基督教随西方的炮舰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业已不是单纯的传教,而是呈多元化趋势,介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影响不断扩大。

在传教史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曾先后四次入华。尤其十九世纪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开展了第四次传教运动,其影响深入而久远。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抵达广州,以东印度公司雇员身份为掩护,从事传教译经等活动。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eman, 1801—1861)到达广州,后在广州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丛报》。此后,郭实腊、伯驾(Gützlaff & Parker)等先后来华传教。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禁闭百年的门户终被打开，各种不平等条约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道光皇帝于1844年、1846年先后颁布敕令批准弛禁天主教，此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办学、出版译著、办医院、建育婴堂。20世纪初，在华传教士在传教布道过程中，常常提出一些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提出了“救个人、救国家”的口号，基督青年会领袖穆德（John R. Mott，1865—1955）等人提出了“如何救中国”、“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中国之希望”等问题，这都扩大了基督教在民众中的声誉和影响。

在此期间，基督教思想常常为国内人们所汲取和引用，有时甚至是相当大胆地“变形化”的引用。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领袖洪秀全早年就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1843年他创立了“拜上帝会”，提出“我们兄弟姐妹，跳出邪魔之门，循行上帝之真道”^[4]的口号。康有为曾“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并谈及基督教认为，“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5]。康有为曾以基督教之马丁·路德自称，构想他的大同理想世界。在夏威夷学医期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更是深受基督教的广泛影响，他自谓“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6]，孙中山汲取基督教思想助成其三民主义，认为“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7]。因而人称：“孙中山革命的抱负，及其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挠，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

[8]

三、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化

2000年3月，《中国现代化和基督教》一书由日本东京新教出

版社出版，著者是国立岩手大学基督教史专家、荣休教授深泽秀男先生。这部 300 余页的日语精装本专著，汇集了深泽教授 20 世纪 60—90 年代以来所撰写的论文 16 篇，其中绝大部分为近年来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新作。全书的研究论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的作用。围绕这一中心论题，全书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 一、中国的现代化和基督教；
 - 二、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基督教徒；
 - 三、中国的现代化和外国传教士；
 - 四、日本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 以及附录：日本的现代化和基督教。

深泽教授在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曾有一个把基督教史的研究视作对帝国主义走卒的研究的不幸的时期，如今，中国人的教会和基督教徒并非帝国主义的走卒这一事实正在得到确证。本书力图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对基督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客观的检讨。”

在第一部《中国的现代化和基督教》中，作者首先通过《概观》概括地说明了中国近代史和基督教史的关系。文中分别论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具体联系，由此阐明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所起到的作用。

在《太平天国和基督教》一章中，著者认为：为了推进自身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领袖采用了基督教教义中伦理的侧面来作为自己的理念，从而辨明了太平天国宗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起承转合。《变法运动和基督教》则以戊戌变法为历史背景，着重通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國早期基督教徒容闳的活动，探讨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基督教信仰者所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参与和作用。

《现代中国的基督教会》则是作者于1990年在实地探访中国教会、神学院和大学的基础上，写出的一篇生动翔实的报告。著者力图在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会实态的同时，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政治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著者认为：无论是在孙中山的时代还是在今天，也无论基督教和中国政治的联系多么错综复杂，基督教的民主的性格得以持续地发展和传扬则为不争的事实。

第二部《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基督教徒》，首先以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早期基督教徒之一、并对洋务运动以至辛亥革命都产生过影响的容闳为例证，通过容闳的自传，解明了容闳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作用。接着，著者又以总理过太平天国朝政、力图在当时推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洪仁玕为例，通过探讨作为基督教徒的洪氏及其代表著作《资政新篇》，说明作为基督教徒的洪氏对太平天国的重大和特殊的贡献。最后，著者论述了作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运动的历史性的关联。著者认为，由于共同的信仰之缘故，孙中山得到基督教信友们的有力支持，这也是他革命得以成功的一个方面。

第三部《中国的现代化和外国传教士》则探讨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所论述的人物包括：曾翻译过《万国公法》、撰写过《中西闻见录选编》、并担任同文馆馆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主编出版过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著有《中东战纪本末》，并创办中西学院的美国人林乐知(Y. Allen)；以及应改革家翁同龢之邀而向中国官僚提出《新政策》的英国人李提摩太，他曾参与山东、山西的饥饿救济运动，由此而痛感中国政治之腐败、改革之必要，他后来成为大学会督办和强学会会员，对变法运动发挥过影响，和孙中山保持过密切的交往。

第四部《日本的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则以目录学的方法，全面而周致地回顾与瞻望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历史与

前景。值得称道的是，该文是作者在1998年应香港浸会大学李金强主编之邀，为《中国近代基督教研究集刊》创刊号所撰写的一篇日文论文。在李教授的安排下，该文的中文本翻译由容闳的后人、日本亚细亚大学的容英英教授担当。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领域里中日两国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一段佳话。

附录《日本的现代化和基督教》中，包括《美国女传教士眼中的盛冈》和《从〈劳动世界报〉看劳动与宗教的关系》两章，则分别为作者为其所在教会所作的教会史研究的一部分，以及对明治时代历史人物的宗教观、劳动观的考察。从女性视角、劳动运动和宗教传播的关联中，透视基督教对日本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

深泽教授在书中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为重点，在点与线的立体交叉中，描述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交互影响与作用的双重轨迹。论述的人物兼及中外，探讨的内容既涉及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物质的层面(如新闻、出版、翻译事业的开拓，现代医疗和学校教育的创设等等)，也深入到中西文化急剧冲突与渐进转化的意识形态之深层。在接受与拒斥、彷徨与苦痛、激昂与沉寂中，基督教文化和精神通过一代杰出的中国基督教信仰者和改革家，以及优秀的外国传教士的忘我无私的劳作，最终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提供新的精神视野和发展的契机。著者以聚沙成塔的方法，在书中引用大量翔实的中外文文献史料，使文章的观点得以确立。同时，由于著者在撰写单篇论文的基础上，兼及全书的宏观布局和构筑，使全书各章节呈现出浑然的整体感，给阅读者以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效果。这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专著中是难能可贵的。

在解读全书的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在该书的字里行间浸透着一位日本学者对中国、中国现代化和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执著与诚挚。这种热诚执著几乎贯穿了著者的一生。现已年逾花甲的

深泽教授在这部新著的后记中写道：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恩师的宿舍里，读到了隅谷三喜男的名著《近代日本的形成和基督教》，从此对近代化和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在东京教育大学（即今天的筑波大学—冯羽注），我专攻亚洲史，在名师们的指导下学习基督教学和中国基督教史。另外，当年年轻的我在四国学院大学当副教授时，曾专程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作了一年基督教史的研究。从大学时代直至今日，40多年过去，当我解明了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作用时，我已在岩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迎来了自己的退休之年。

关于深泽秀男教授的印象，我曾经在《亚洲史诸问题》——这本由日本、中国和香港两国三地学者共同撰写的国际学刊——的日语编后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深泽教授经常提及世界主义者 (Cosmopolitan) 这个词。平日里，先生在他的研究室里交替使用古旧的电动打字机和崭新的电脑，编织他彩虹般的学术之梦。他也不断用国际电话、传真和 e-mail，与国际学术界的友人保持密切的往来。

在教学研究之余，先生常常和学生们一道翻阅书架上各种大型外国语词典和外国地图册。在这样的时刻，这位生活在岛国的日本教授的思绪，也许已然越过海洋，飘向古老的中国大陆和遥远的巴尔干半岛。

以他人为重——这也许是深泽教授学术生涯的不同凡响之处吧。

相信读过深泽教授新著的朋友一定会获此同感。